

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历史进程、 基本特点和经验启示

于安龙, 梁露行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50)

摘要: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作风问题,持之以恒地推进作风建设,不断深化对作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形成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推动着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取得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经历了初步探索期(1921—1949年)、曲折发展期(1949—1978年)、改革重塑期(1978—2012年)和创新拓展期(2012年至今)4个阶段。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批判与建构、现象与本质、整体与部分、阶段与长远、思想与制度等关系,作风建设由此呈现出破立结合、标本兼治、统筹协调、“常”“长”并举、刚柔相济等基本特点。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需要坚守人民立场、注重制度建构、服务发展大局、坚持问题导向、发扬斗争精神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党的建设; 作风建设; 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4339(2026)02-111-10

优良作风是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1]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将作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一以贯之地推进作风建设,将自身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学界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进行了研究,大致可分为3个方面。其一,从思想史角度把握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多数学者聚焦于不同历史时期,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2]、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3]、新时代以来的实践^[4]等来分析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也有部分学者以百年历程为视角^[5]展开研究。其二,从人物史角度研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作风建设思想。学者们主要围绕毛泽东^[6]、周恩来^[7]、陈云^[8]、邓小平^[9]、习近平^[10]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作风建设思想展开研究,并形成了一些较高质量的成果。其三,从概念的角度探讨作风建设的本质内涵。有学者分析了党的作风建设的意义、本质、基本特点、内容体系等,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基础性学理支撑^[11]。

纵观已有研究,成果丰硕、见解深刻,为后续研究

的深化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在整体性视角的研究上稍显不足,仍存在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历史进程,把握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基本特点和经验,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推进作风建设、怎样推进作风建设等重大问题,对于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史,也是一部作风建设史。在不同历史时期,党的作风建设主攻方向和主要任务各有侧重,其中的思路与方法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结晶,丰富和拓展了党的作风建设实践经验。

1. 初步探索期(1921—1949年)

马克思主义蕴含着强大的真理力量,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科学理论指导。其中,“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12]的重要观点揭示了理论与

收稿日期: 2025-07-23.

基金项目: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学理化研究”(TJJD25-01).

作者简介: 于安龙(1986—),男,教授.

通信作者: 梁露行, h1780559269@163.com.

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运动始终“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13],必须密切联系群众;“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4],内在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发扬批判精神,等等。这些基本观点和重要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加强作风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虽然力量弱小,但已深刻认识到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并将其置于党的建设的重要位置。陈独秀、李大钊等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积极组织工人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已进行了作风建设的先期探索。毛泽东在深入调查研究、开展群众运动、将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并且在古田会议上提出了“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15]的重要论断。这些思想和实践孕育着三大优良作风的萌芽。然而,由于“左”右倾路线错误的干扰,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思想逐渐在党内盛行,阻碍了优良作风的发扬,影响着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

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党的作风建设新阶段。193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首次明确提出并阐释“作风”^{[15]277}概念,倡导学习和运用伟大精神与优良品格改造自身,体现了党对作风问题的高度重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6]的重大命题,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联系中国具体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标志着党对理论联系实际作风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党从正反两方面深刻剖析党的作风建设状况,在实践中产生了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党的历史来改造思想、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进行斗争、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宝贵经验,形成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重要著作,廓清了党内长期存在的思想迷雾,凝聚了团结奋斗的伟大力量。

党的七大在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基础上,凝练总结了三大优良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17]。其中,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处于基础地位,指导着中国共产党从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高度解决问题,有力破除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密切人民群众的作风是三大优良作风的关键与核心,是对党长期以来积累的基本工作经验的总结,更是党能够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克服矛

盾、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和锐利武器,体现出党的高度自觉性和强大生命力。三大优良作风相辅相成、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的核心内容。三大优良作风连同独立自主、艰苦朴素、团结友爱等其他优良作风,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推进作风建设的重要支点。自此,弘扬优良作风成为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

2. 曲折发展期(1949—1978年)

坚持弘扬优良作风,为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但革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弘扬优良作风的结束,相反,要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依然需要继续弘扬优良作风。面对着全国执政的新考验、新挑战,为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了“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8]的号召。“两个务必”继承了三大优良作风的实质,丰富了优良作风的内涵,对党的作风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地位发生变化,党员数量急剧增长,党的组织发展壮大,但“大规模发展党员难免出现新发展党员质量无法保证的问题”^[19]。与此同时,领导干部在工作中逐渐滋生出“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作风”^[20],严重威胁着党和国家事业健康发展。“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的实践证明,通过开展整风运动来提升党员素养、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中国共产党延续这一光荣传统,发扬三大优良作风,坚持“两个务必”,针对各类突出问题,多次开展整风运动,极大地改进了党的作风,激发了党和人民昂扬奋进的精神。

1950年,党中央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现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突出问题,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通过学习文件、总结和分析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式对党内存在的不良作风进行整顿。1951到1954年,分阶段、分批次地整顿党的基层组织。针对贪污、浪费、偷税漏税、官僚主义等具体问题,先后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纯洁了党的队伍,提升了党员素养。党的八大在总结历史经验、分析形势、部署社会主义建设主要任务的同时,深刻剖析作风问题,指明党的作风建设方向。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指出,党内仍存在“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21]。这些不良作风不利于党的团结进步,阻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党内思想教育予以克服。

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对于党组织和党员来说,“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21][20]}有增无减,要继续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21][23]}。1957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强调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主题开展整风运动,“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22]。由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不准、党的建设主要方向判断不明,1957年之后党的作风建设经历了反复与曲折,期间遭遇的挫折值得深刻反思。

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整风运动有效清除了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进一步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增强了党的团结统一。但随着作风问题的反弹回潮,运动式整风的历史局限性日益暴露。对此,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善于运用辩证思维,将其中的经验与教训转化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动力。

3. 改革重塑期(1978—2012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恢复和发展党的优良作风提供了历史契机。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生死存亡”^[23]的高度看待党的作风建设,为恢复和发展党的优良作风奠定了重要基础。“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23][178]}邓小平首先从党的高级干部整起^{[23][15]},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普遍不满意的干部特殊化问题。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党的重要法规来约束党员行为,促进了党的优良作风的恢复与发扬。《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党的作风建设纳入“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24]之中,体现出党对作风问题的高度重视。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对整党的任务、方法、步骤等作出系统部署,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明确规范。《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将党的作风建设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贯通,使党的作风建设深度和广度得到提升。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党的形象”^[25]定位作风问题的重要性,着重从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等方面加强作风建设。江泽民从正反两方面剖析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与不足,通过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健全民主集中制、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等举措改进党的作风,“把党建设成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26]。《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对开展调查研究、改善党群关系、建立和完善监督党组织和党

员干部的制度等方面提出详细要求,为党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提供了有力保障。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不仅要求“逐步建立健全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27],更强调着力解决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以及领导干部3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弘扬团结奋斗精神推进事业发展。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是党的历史上首次以作风建设为专题制定的重要决定,系统阐释了作风建设“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主要任务,提升了党的作风建设规范化水平,开启了新世纪党的作风建设新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28],接续推进党的作风建设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有利形势,中国共产党人清醒认识到越是形势好,越要坚持求真务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推进事业进一步发展。弘扬求真务实精神,不仅要加强思想教育,更要“切实建立健全制度”^{[28][159]}。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将执政能力建设作为根本建设,要求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加强廉政法制建设等。《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倡导大兴密切联系群众、求真务实、艰苦奋斗、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并提出要建立健全工作责任制、征求群众批评意见制度、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等等。

4. 创新拓展期(2012年至今)

由于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一段时间“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1][119]}问题突出,新旧作风问题叠加碰撞、交织发酵,给党的作风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党的十八大后,《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出台,聚焦党内长期存在的八种典型问题,提出可操作、易落实的具体要求,并强调中央政治局带头示范、上行下效。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针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四风”问题,从小抓起、以小见大,解决了新形势下作风建设抓什么、怎么抓的问题。

通过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落实。从2013年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2026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9次主题教育等涵盖范围广泛、活动方式多样,具体教育内容虽各

有侧重,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穿始终,推动着党员整体素养不断提升。与此同时,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坚决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将民主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方式同党内监督相衔接,运用新技术拓展监督手段,增强监督合力与实效;惩治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发挥警示教育震慑预防作用;加强巡视工作,严肃问责查处失职、渎职等问题。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07.6万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52.3万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99.5万人”^[29]。彰显出中国共产党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坚持不懈推进作风建设,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我们抓中央八项规定贯彻落实,看起来是小事,但体现的是一种精神”^[1167]。制定和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只是作风建设的切入口,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深化和细化,久久为功,积小胜为大成,使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化风成俗,让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一方面,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全面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坚持自上而下、以上率下,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抓起,首先抓好中央领导的作风建设。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遵规守纪,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监督,做到清正廉洁,秉公用权,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另一方面,建章立制,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保障。出台《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一系列党内法规,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不断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使党的作风建设相关制度更加完善和健全。这些重要制度不仅是对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实践经验的总结,更是持续深入推进作风建设的重要规范与保证。

当前,党的作风建设取得伟大成就,“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30]。但这并不意味着党的作风建设已经收官完成,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党内仍然存在着一些同其性质宗旨相违背的思想和行为。这就需要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中央八项规定为突破口,不断把党的作风建设向纵深推进。

二、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基本特点

作风建设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发展历程之

中,虽然不同时期作风建设的着重点、突破口等不尽相同,但一些具有规律性的东西蕴含其中,反映着党的作风建设的基本特点,如破立结合、标本兼治、统筹协调、“常”“长”并举、刚柔相济等。这些特点具有实践性、时代性,是在党的作风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彰显出来的。

1. 破立结合:正确处理批判与建构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批判与建构的关系,通过批判不良作风,进一步发扬了优良作风,并且深刻认识到“作风建设是立破并举、扶正祛邪的过程”^[31]。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明确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171812]的任务,促进了三大优良作风的发扬。邓小平在1985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32]必须加强防范和打击严重犯罪活动、坚决制止和取缔腐败现象、“严格禁止坑害勒索群众”^[32145]等,推动了党风与社会风气的好转。江泽民向全党提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抄照搬、本本主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25]324}等要求,推进着全党思想解放、贯彻群众路线以及艰苦奋斗。胡锦涛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指出,领导干部队伍存在着“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28]7},要求坚决反对浮躁浮夸、急功近利、铺张浪费、大手大脚等,激励全党弘扬艰苦奋斗精神。习近平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治“四风”树新风并举,使党能够以优良作风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拥护。申言之,党的作风建设从来都是将批判与建构紧密联系,有效遏制了不良作风的滋生与蔓延,促进了优良作风持续发挥作用。

以历史决议的方式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凝聚奋进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推进作风建设的伟大创举。党在重大历史关头先后出台了三个历史决议,其制定过程与主要内容鲜明体现了破立结合的特点。就起草过程而言,三者均是集思广益、发扬民主、数易其稿形成的理论成果,深刻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密切联系群众等优良作风。就主要内容而言,三者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批判与建构有机统一。第一个历史决议从政治、军事、组织、思想四方面对彼时尚未肃清的“左”倾错误进行揭露与批判,并提出坚持“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17]987}等基本要求;第二个历史决议从正反两方面实事求是地总结党的奋斗历史,

恰如其分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驳斥了将历史人物神圣化和污名化的错误倾向,促进了党的思想解放,增强了“党的团结”^{[24]61};第三个历史决议内在蕴含着自我革命精神,不仅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成就与经验,并且警醒全党必须“始终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从伟大胜利中激发奋进力量,从弯路挫折中吸取历史教训”^[33],不断推进民族复兴伟业。概言之,三个历史决议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的集中体现,其制定通过的整体过程以及主要内容所展现出的卓越智慧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典范。

2. 标本兼治:正确处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

现象与本质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现象呈现事物的表面,往往复杂多变,具有动态的特征,是“标”。本质反映事物内在的规定,具有相对稳定性,是“本”。本质寓于现象之中,并通过现象体现出来,在实践中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现象与本质的辩证统一关系,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指导。另外,正确处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要将真象与假象、错觉等区分开来。“标本兼治,关键在治,治是根本。”^[34]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从作风问题的现象入手,剖析作风问题本质,深化标本兼治,不断改进党的作风。

坚决狠刹不正之风,惩治乱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针对党内存在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现象,开展“五反”运动对之进行有力整治。邓小平面对脱离群众、贪图享乐、铺张浪费等乱象,通过恢复党的一整套优良作风予以解决。对于党内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等消极腐败现象的滋长蔓延,江泽民深刻剖析了产生腐败现象的社会历史原因,强调“加强反腐败斗争,推进党风廉政建设”^{[26]318}。胡锦涛指出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着不思进取、工作不实、急功近利、自搞一套、心态浮躁等十方面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倡导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习近平将文山会海、权力寻租、公款吃喝、骄奢淫逸等一系列作风问题概括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并且十分警惕作风问题隐形变异的新动向,持续保持高压态势,时刻防范、重拳出击。

把握作风问题本质,固本培元。毛泽东曾深刻指出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同“德波林的唯心论”^{[15]299}具有极大的关系,必须加强哲学研究,破除其带来的消极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立足于党的作风建设实践,揭示了“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11]8}。党性在根本上是立场问题,“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11]7}。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便能公私分

明、廉洁奉公,优良作风将持续发扬;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就容易徇私废公、杂念丛生,不正之风便会潜滋暗长。作风问题反复出现,不正之风仍有市场,在主观上是由于思想认识不足、思想基础不牢,在客观上是由于管党治党的方针未有效落实,存在一定的宽松软情况。“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坚定理想信念是根本。”^{[11]9}中国共产党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通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理论武装,改造主观世界,密切联系群众,确保自身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同时运用法治手段纠风肃纪,强化刚性约束,规范和保障作风建设。既不能因为党的作风建设取得些许成绩就止步不前,也不能因为党内客观存在问题而迷失方向,而是要充分把握党的作风建设的内在规律,驰而不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在斗争实践中坚定理想信念,“透过作风看党性,在解决作风问题的基础上解决好党性问题”^{[11]7}。

3. 统筹协调:正确处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整体与部分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整体是由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部分组成的庞大系统,反映着事物的全局。部分在整体中发挥作用,并由整体统帅与决定,反映着事物的局部。整体与部分内在联结、不可分割,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既不能只强调整体而忽视部分,也不能只关注部分而忽视整体。正确处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必须运用系统思维,总揽全局、统筹协调,实现整体与部分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将作风建设同其他建设相贯通,不断深化对作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推动着作风建设的纵深发展。

党的作风建设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始终是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逐渐探索并形成了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在内的党的建设系统格局,奠定了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基础。其中,思想建设具有基础性地位。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解决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17]875}等问题,并且认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17]1094}。组织建设则发挥着支撑作用。中国共产党坚持民主集中制,以严格的纪律约束党员行为,不断增强党的建设质量,使得“党的组织……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35]。而作风建设贯穿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以及其他建设之中,并通过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等方面体现出来。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纪律建设等重要方面被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之中,使得这一系统日臻成

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构建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34]51}的总体布局,各个部分之间良性互动、并行不悖。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作风建设作为切入点和着力点,坚持统筹协调,把作风建设融入党的其他建设之中,“使作风建设随着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推进而同步深化”^{[1]155}。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运用系统思维推进作风建设,既注重发挥党的建设系统中各部分的独特优势,又持续凝聚起强大合力,不断提升党的作风建设水平。

4. “常”“长”并举:正确处理阶段与长远的关系

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党的作风建设同样是一个过程。中国共产党既围绕每个阶段的任务集中整治作风问题,又着眼于长远目标经常整治作风问题。集中整治具有针对性、时效性、阶段性等特征,发挥着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作用。经常整治具有长期性、稳定性、持续性等特点,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能够巩固和保障集中整治的成果。党的作风建设坚持正确处理阶段与长远的关系,将集中整治与经常整治相结合,呈现出“常”“长”并举的鲜明特点。

党的作风建设不同阶段,面临着不同的任务。从历史脉络来看,党的作风建设历程同党的奋斗历程大体一致,经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4个阶段。由于各个阶段作风问题的表现形式多样,程度也有所不同,因此解决作风问题的主要任务、具体方式存在分殊,但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始终以兴党强党为目标,以密切联系群众为核心。当然,不同阶段的作风建设是整体与部分、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统一,它们彼此之间并非毫无关联、相互割裂的。相反,不同历史时期的重点举措前后相继、内在连续,前一阶段的实践为后一阶段的举措提供方法和指导,后一阶段的举措是对前一阶段实践的延伸和拓展,体现着前一阶段实践中蕴含的精神实质,彼此交融、交相辉映。中国共产党通过各个阶段的集中整治,极大提升了党员素养,增强了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丰富了党的作风建设经验。

“党的作风和形象关系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1]9}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长远目标是使中国共产党能够永葆初心使命、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厚植党的执政根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步。中国共产党由弱到强、由小到大,党员数量由

成立之初的50多名发展到如今的1亿多名,期间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伟大成就,但也面临着大党独有难题。有效解决“六个如何始终”的问题,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更加健全的制度保障、更加丰富的方式方法、更加完善的系统布局,这就决定了作风建设必然是一个与时俱进的长期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的深化,从“第一个答案”到“第二个答案”的拓展,从提出“伟大的工程”^{[35]602}任务到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深入推进,中国共产党始终着眼于长远目标,经常整治作风问题,持之以恒推进作风建设,“以优良作风把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1]36},推动着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

5. 刚柔相济:正确处理思想与制度的关系

事物的发展变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就党的作风建设而言,始终存在着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两种方式。思想建设从内部发挥着柔性作用,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动力;制度建设从外部发挥出刚性作用,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保证。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具有互补性,彰显着自律与他律的独特优势。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有机结合,并不意味着二者地位相同。思想建设具有基础地位,决定着制度建设的方向、目标和任务。制度建设具有关键地位,能够塑造思想、规范思想建设、巩固思想建设成果。党的作风建设始终坚持正确处理思想与制度的关系,促进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同向发力、同时发力。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注重通过思想建设改进作风,同时对制度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党员成分比例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逐渐在党内蔓延。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对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等错误思想展开批驳,并且提供了有效的改造与教育方法,促进了思想作风的好转。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17]875}经过长达3年的整顿,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为思想建设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新中国成立后,党始终坚持通过思想建设改进作风,多次开展整风运动改造思想,巩固了新生政权。与此同时,党初步构建了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作风建设制

度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将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并重并举。邓小平坚持理想与纪律两手抓、两手硬,强调“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23][332]}。江泽民认为“制度建设必须同思想建设结合起来”^{[26]95},并将党的制度建设贯穿于其他建设之中。胡锦涛要求全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密结合党的执政实践,不断加强执政理论建设和制度建设”^{[28]244},在实践中颁布和执行各项制度,使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相结合的程度进一步深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继承以往智慧和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相结合的实践。习近平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在部署全面依法治国重大战略的过程中,“注重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36],促进党的作风建设法治化。同时高度重视思想建设,强调“在加强党性修养的同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21},提升党员的思想境界与道德修养。

三、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经验启示

善于总结经验是党的优良传统与制胜法宝。“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34]376}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坚守人民立场、注重制度建构、服务发展大局、坚持问题导向、发扬斗争精神等方式推进作风建设,将党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前进道路上面临的风险挑战仍然严峻复杂,要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作风,运用宝贵经验不断推进党的作风建设,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的胜利。

1. 坚守人民立场推进作风建设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决无私利,始终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并在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1]40}。

毛泽东将人民群众形象比喻为“铜墙铁壁”“眼睛”“土地”等,并在实践中重视深入、动员、组织、教育群众,发挥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依靠人民群众解决问题。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正式提炼概括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7]899}的工作方法,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科学路径。“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33]166}因此,毛泽东倡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和发扬群众路线,并且将民主集中制同群众路线相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坚决抵制危害人民群众利益思想和行为,进行了打击经济领域犯罪、反对领导干部特殊化、整治精神污染等活动,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展的首个党内集中教育活动便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为主题,体现了党对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的高度重视,奠定了党的作风建设基调。“开展调查研究就是走群众路线”^[37],中国共产党坚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通过互联网等渠道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深入实际、多维比较、去伪存真、由表及里,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不断提升调查研究能力,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与此同时,坚持“以人民满意为标准”^{[1]65}判断作风好转与否,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实践证明,党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事业便会发展顺利;反之,事业便会遭遇挫折甚至走向衰亡。新时代新征程上,党仍然面临着“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真正解决好作风问题,必须时刻牢记“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与优良作风,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倾听民声、尊重民意、顺应民心,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让人民群众可感可及。

2. 注重制度建构推进作风建设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健全科学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能够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保障。“从党内法规制度入手,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保持清醒认知、克服各种消极现象的理性选择。”^[38]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发挥制度的作用,并在实践中建构了一套制度体系,使得党的作风建设日益规范、愈加科学。“走出作风问题抓一抓就好转、松一松就反弹的怪圈,从根本上说还是要靠科学有效的制度。”^[39]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运用制度指导实践,真正解决作风问题。同时,避免脱离具体实际、过分重视制度而忽视实践经验的错误倾向。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建构,为党的作风建设强化保障、增强引领。

一方面,通过制度建构保障作风建设。制度如果不完善、不健全,则难以有效发挥其约束作用;制度如果不执行或执行不彻底,则无法真正彰显其生命力。“对发现的作风问题,要举一反三,完善政策措施,加强制度建设,扎紧制度笼子。”^[40]既要及时总结作风建设取得的成功经验并形成相应规章制度,又要与时俱进更新、修订、废止关于作风建设的条例和规定,使其符合实践发展要求和时代特征。同时,要将制度执行贯穿于作风建设的全过程,激励遵规守纪的模范和榜

样,惩治违法乱纪者,做到奖罚分明,实现激浊扬清。另一方面,通过制度建构引领作风建设。事实上,制度建构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科学合理的制度往往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步骤制定而成,不仅能够解决现存问题,还能够防患于未然。“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41]自1990年出台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明确提出有计划、有组织地制定党内法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先后制定了《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第二个五年规划(2018—2022年)》《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规划纲要(2023—2027年)》,不仅促进了相关制度的完善和健全,更引领了党的作风建设方向。

除此之外,还要建立和完善作风建设相关制度的评价机制,对制度进行合理评估,对执行制度的状况与程度进行及时监督,确保制度建构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3. 服务发展大局推进作风建设

“作风建设是为党的工作大局服务的。”^[14]中国共产党围绕中心任务加强作风建设、改进作风,目的是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党根据社会主要矛盾以及自身面临的主要任务,调整作风建设的重点,保证党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了党的建设过程“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35]605}的客观事实以及必要性,为党的作风建设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通过理论武装、严明纪律、增强团结等方式不断改进作风,推动着革命事业走向胜利。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巩固新生政权与发展经济,中国共产党开启整风整党运动,有效抵制了贪图享乐、居功自傲、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促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围绕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推进作风建设,“努力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42]。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同腐败行为作斗争,改善党群关系,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强调:“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要求全党同志必须有优良作风。”^{[30]121}中国共产党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推进作风建设,鼓舞和激励着全党团结奋斗,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历史证明,服务发展大局改进党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一条重要规律。

作风建设的目标固然是要建设一个富有生机活力

的强大政党,但根本来说是要使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更好发挥出领导核心作用。党的二十大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并且明确了当前阶段党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保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优势。推进作风建设,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服务于新时代发展大局的内在要求。所以,新形势下加强作风建设,需要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处理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若干重大关系,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将党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4. 坚持问题导向推进作风建设

问题的实质是矛盾,坚持问题导向要在承认矛盾普遍性和客观性的基础上不断化解矛盾、破解难题。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现问题是前提,分析问题为中介,解决问题为目的,三者相互联系、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坚持问题导向的逻辑链条。

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将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视为党内存在的“一个大问题”^[43],揭露其社会根源是反动作风的残余在党和政府内的反映,要求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进行坚决斗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首先要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32]144}。党员以身作则,对照党章的相关规定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必要时采取纪律措施,进而改进党的作风。江泽民揭示了党内“不适应改革和建设的新形势、不符合人民群众意愿的突出问题”^{[25]323},深刻分析其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强调通过解放思想、贯彻群众路线、艰苦奋斗进行解决。胡锦涛指出党面临着“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而“经受考验、化解危险,最根本的是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44]。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将“四风”作为加强作风建设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并且特别强调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习近平指出:“这些问题必须从讲政治的高度来审视,从思想和利益根源上来破解。”^{[1]90}中国共产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深刻认识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在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官本位思想等因素的影响下造成的,具有多样性、变异性等特征,会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效贯彻落实,侵蚀党的执政基础。破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必须把握它们在不同时期、地区、部分的特殊表现,着力解决老问题与新

问题、显性问题与隐性问题、表层问题与深层问题。

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敏于发现问题、善于分析问题、勇于解决问题,为党的作风建设积累了一系列经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加强作风建设,及时发现问题,运用科学思维分析问题,进而有效解决问题,确保党能够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5. 发扬斗争精神推进作风建设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精神力量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转化为物质力量,进而改造客观世界。斗争精神在本质上属于意识,其产生与发展离不开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实践。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攻坚克难,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发扬斗争精神是极为关键的原因。

作风建设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而作风问题不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打赢作风建设这场攻坚战和持久战,同样需要发扬斗争精神、坚持不懈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面对突出的“四风”问题,分析其实质、根源和后果,精准发力、有的放矢,着重解决工作不实、对人民群众利益不维护和不作为等问题,坚决克服及时行乐思想、特权现象、挥霍享乐和骄奢淫逸等不良风气,有效遏制了“四风”问题的蔓延。习近平指出:“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34][258]}对于违背重大原则、偏离正确方向思想和行为,不能妥协退让、放任自流,必须坚决清除并积极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相互交织,是现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1][125]}需要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铲除风腐共性根源,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同时,坚持抓惩治和抓责任相统一,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鼓励担当作为,激励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发扬斗争精神以推进作风建设,需要有一叶知秋、见微知著的能力,善于发现和解决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同时要有同各种不良作风作斗争的勇气和韧性,才能推动作风建设取得实效。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三个务必”重要论断,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丰富了优良作风的内涵,同时揭示了新征程上发扬斗争精神的重要性。事实上,坚持发扬斗争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断丰富党的作风建设经验,有利于推进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防范化解前进道路上的风险

挑战,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3.
- [2] 刘蕊. 新中国成立以来执政党作风建设方略的回顾与审思[J]. 山东社会科学,2024(10):26-35.
- [3] 王永浩.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回顾与基本经验[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1):48-57.
- [4] 王东. 高中华. 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的经验积累及深刻启示[J]. 理论视野,2025(7):95-100.
- [5] 冯留建,江薇. 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历史考察及主要经验[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6):66-74.
- [6] 赵丛浩. 毛泽东:树立“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J]. 党的文献,2025(1):2.
- [7] 张谨.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对党的三大作风的倡导与践行[J]. 党的文献,2021(5):66-72.
- [8] 黄彦萌. 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对党的作风建设的认识与贡献[J]. 党的文献,2025(3):63-69.
- [9] 赵家春. 邓小平关于思想作风建设的重要理论贡献[J]. 求实,2012(S2):241-242.
- [10] 张传鹤.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重要论述的基本内容及其精神实质[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7):51-58.
- [11] 曹劲松. 党的作风建设的本质与实践逻辑[J]. 南京社会科学,2025(6):1-9.
- [1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91.
- [1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2.
- [1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
- [15]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0.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五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51.
- [17]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4.
- [18]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8-1439.
- [19] 郑琦. 中国共产党加强党员队伍建设的基本经验[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5):104-116.
-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67.
-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35.

-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223.
- [23]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58.
- [2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54.
- [25]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30.
- [26]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87.
- [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958.
- [28] 胡锦涛. 胡锦涛文选:第二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52.
- [29]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成效和经验 [N]. 人民日报,2025-05-26(1).
- [30]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1.
- [31] 习近平在指导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强调作风建设要经常抓深入抓持久抓 不断巩固扩大教育实践活动成果 [N]. 人民日报,2014-05-10(1).
- [32]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4.
- [33]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72.
- [34]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25.
- [35]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12.
- [36] 王 锐,倪 星. 作风建设、政党纪律与党的自我革命:基于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执行情况的理论思考 [J]. 政治学研究,2024(3):64-75+242-243.
- [3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选编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84.
- [38] 陈家刚. 中国共产党加强作风建设的制度路径、实践价值与时代要求 [J]. 中共党史研究,2025(4):16-26.
- [39]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依规治党论述摘编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118.
- [40]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157.
- [41] 习近平对“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 高质量完成“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 [N]. 人民日报,2025-05-20(1).
- [4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7.
- [4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9.
- [44] 胡锦涛. 胡锦涛文选:第三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577.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and Lessons Learned from Work Styl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Yu Anlong, Liang Luhang

(School of Marxism,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For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dvanced its cause by improving its style construction and has continuously advanced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style with perseverance. In this process, it has constantly deepened its understanding of the regularity of style construction and accumulated valuable historical experience. Its efforts have spanned four stages: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1921—1949), tortuous development (1949—1978), reform and reshaping (1978—2012), and innovative expansion (2012—presen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correctly handl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criticism and construction, phenomena and essence, the whole and its parts, stages and long-term goals, and ideology and institutions. As a result, its style construction has presented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integrating demolition and construction, addressing both symptoms and root causes, ensuring overall coordination, emphasizing both constancy and long-term effort, and combining toughness with softness. Continued improvement on the new journey of the new era requires adhering to the people-centered principle, strengthening institutions, serving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sticking to a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fighting spirit.

Key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arty building; style construction; lessons learned

(责任编辑:王 青)